

#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



李曦辉<sup>1</sup> 弋生辉<sup>1</sup> 黄基鑫<sup>1,2</sup>

(1.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1;

2.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做出的与时俱进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中国适应内外部条件变化的必然选择。本文在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发展的历程与指导理论的基础上,分别利用国际和国内层面的投入产出数据,通过投入产出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价值增值分析等,实证检验了国际经济循环和国内经济循环的发展情况,探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践渊源与发展变迁,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与发展趋势。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由社会主要矛盾的内生因素驱动而形成,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具备现实的可行条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中国版全球化的发展范式,突破当前全球化的不足,实现生产要素配置的更大规模与范围效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够助推中国经济继续腾飞,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投入产出模型 社会主要矛盾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1)07—0005—20

## 一、引言

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带领中国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以主动融入全球化推动中国和全球经济大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依托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中国选择了“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不断深化,“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面临新的挑战,原本廉价的劳动力要素在国际贸易中已不具备其优势地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挑战,逆全球化表现出新的特征,加之各国经济增长乏力,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内国际新形势,国内经济循环面临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拓展国内市场需求的压力,国际经济循环面临外贸市场萎缩和外商投资、对外投资受限的难题。

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势必要求全球化理论的突破和创新,以适应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为中国创新经济理论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曾经对中国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出口和投资不足

收稿日期:2021-04-15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及其国际比较研究”(19ZDA173)。

作者简介:李曦辉,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是区域经济学、民族经济学,电子邮箱:xihui\_li@qq.com;弋生辉,男,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是工业社会与管理,电子邮箱:yishenghui@muc.edu.cn;黄基鑫,男,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是民族经济和企业管理,电子邮箱:huangjixin@cufe.edu.cn。通讯作者:黄基鑫。

以支撑中国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这势必要要求转变发展思路和创新方式,以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主动寻求新版全球化范式变革,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事实上,历经百年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向全球贡献智慧和力量,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一带一路”倡议,都是规避强权与不平等的全球化理论创新,是将中华民族平等发展的经验推广给所有爱好和平、寻求发展的国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来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伟大构想,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创新经济发展战略,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阐述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sup>①</sup>。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讲话指出,“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并不矛盾,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习近平,2020)<sup>[1]</sup>。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正是对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一关键命题的破题,也是对社会各界关于新发展格局关切的回应和科学判断,阐明了新发展格局的目的是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既是为了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也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指明方向。“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使命,中国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继续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双向需求与双重挑战,兼具“双向兼顾、内外双修”的特殊性(欧阳康,2018)<sup>[2]</sup>,要在畅通国内循环的同时,优先周边畅通区域循环,并逐步畅通全球循环(傅梦孜,2020)<sup>[3]</sup>;要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从“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黄群慧,2021)<sup>[4]</sup>,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和形成新的国际供应链(裴长洪和刘洪愧,2020)<sup>[5]</sup>。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是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关键环节,对于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后,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形成了一大批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指南的成果。然而,现有文献大多从理论层面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展开论述,鲜有从实证视角出发的研究。同时,定性分析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只能从宏观视角勾勒出研究问题的框架,使得从微观视角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分析受阻。为此,有必要从实证视角出发,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深刻剖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于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早日形成,具备重大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采用国际层面的投入产出数据(WIOD)和国内层面的投入产出数据,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价值增值分析方法,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与西方传统大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实证对比研究,探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发展现状与问题等,为早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指导。

## 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推动“双循环”经济发展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由内生因素驱动而主动形成的战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外生因素的影响有限。从海关总署公布的2020年进出口总额<sup>②</sup>可知,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在2020年创历史新高,总额为32.16万亿元,相较2019年增长1.9%,其中,出口增长4%,进口下降0.7%,贸易顺差3.7万亿元,增长27.4%,进一步巩固

① 资料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20-08/25/content\\_5537101.htm](http://www.gov.cn/xinwen/2020-08/25/content_5537101.htm),访问日期:2020-12-09。

② 资料来源:<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1/202102/20210203038236.shtml>,访问日期:2021-02-10。

了中国作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由此可知,国际贸易的外生因素并没有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从百年来共产党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角度,结合近百年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迁来分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机理和逻辑。结合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本文将中国共产党探索和推动经济“双循环”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其中阶段分隔点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自此中国经济逐步走上正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思路拥抱全球化,中国内外循环的发展出现了重大的转变;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双循环”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 1. 国内国际两种循环的理论准备与实践探索阶段(1921—1949年)

中国共产党1921年诞生,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武装斗争,以井冈山为根据地播种革命火种,再后来在江西瑞金建立红色政权,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探索。经济建设作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工作,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曾对国民党军队封锁下的苏区经济发展进行过阐释,“货物出口发生困难”,“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但是,“因为广大群众的需要,我们自己即有广泛的市场”,因此发展工业“应该首先为着自给,其次也是为着出口,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毛泽东,1967)<sup>[6]</sup>。这是基于苏区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做出的最早的内外循环的阐释,具有重要的意义。

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多个敌后根据地,发展根据地经济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一直备受重视。1944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双方有利原则下,我们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可见党内对战后引进外资必要性的认识是很客观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也强调了引进外资的重要性。1946年6月,党中央在《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要“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矿”(刘建丽,2019)<sup>[7]</sup>。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未来国家发展建设过程中,资本来源在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这是两个循环理论与实践方面早期系统的论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动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阶段(1950—1978年)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双循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这期间主要进行了内循环为主的尝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目前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毛泽东,1976)<sup>[8]</sup>。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要兼顾沿海和內地的关系,实现平衡布局。

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实施内循环为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内生驱动。1956年党的八大概括社会主要矛盾为: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的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同时战争遗留的一系列问题也有待解决。新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然而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手段获得资本原始积累,进而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已行不通,中国必须走一条符合自身国情,西方国家从没走过的道路。

同时,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包围和封锁,并在周边制造了紧张的国家安全形势。因此,在内外因素合力的作用下,中国最终选择了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在

改革开放之前的时间里,这一战略取得了一些成就,包括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1981)<sup>[9]</sup>。

### 3. 改革开放推动国际经济循环大发展的阶段(1979—2012年)

1978年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内外循环在这一阶段均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以及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工作重心发生的转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新概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发展进程中。有效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因此,这一阶段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基于此,邓小平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4)<sup>[10]</sup>。即首先集中优势力量,促进沿海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此种发展模式较平衡布局的发展模式而言具有极大的优势,资金、技术、人力等要素都优先供给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凭借大量的要素资源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而后,由沿海地区帮扶内地发展,缩小内地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确立和发展的(王建,1988)<sup>[11]</sup>。以沿海地区为重点,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实现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为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和建设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4.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阶段(2013年以来)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兴起,逆全球化趋势加速,加之对于中国迅速崛起的普遍担忧,西方国家开始在各方面对中国施压并制造摩擦。中国面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多边经贸合作趋向停滞、传统全球价值链面临破裂风险的新挑战(余森杰,2020)<sup>[12]</sup>。这是因为,“现今的全球秩序仍体现出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扩展,以西方国家占据政治、经济领域的传统优势为主要特征,表现为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分工中位于较高层次,他们在重要的全球性治理机制中掌握主要话语权”(杨娜和王慧婷,2020)<sup>[13]</sup>。这些思潮与20世纪末的“民族国家终结论”(莱斯利·里普森,2001)<sup>[14]</sup>是背道而驰的,当时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付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应该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政府,来实现全球的有效治理(于春阳,2015)<sup>[15]</sup>。在今天,人们又开始“找回国家”(任剑涛,2020)<sup>[16]</sup>,认为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没有衰退,反而还凸显起来,各国都想利用国家的竞争优势来占据全球化中的有利位置。在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新版全球化的实施不能完全依托旧有范式,又不能完全抛弃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正如塞缪尔·亨廷顿(1999)<sup>[17]</sup>所言:“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在此背景下,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自此,中国内外循环的发展步入了新的阶段。随着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施,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了改善。而发展所带来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迫切需要得到解决。之所以会出现国民经济发展主战场的国内外转换,是因为中国已经逾越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依靠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发展阶段,走过了重点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区间,走向主要依靠创新支撑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当今社会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科学论断使“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提出有了基本前提。

“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打破了西方主导下经济全球化“中心—外围、核心—边缘”的不

平等发展格局。追求“多元平衡”的平等合作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理念的行动纲领(裴长洪和刘斌,2020)<sup>[18]</sup>;倡议的实施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范式重构(刘伟和王文,2019)<sup>[19]</sup>,被认为是以“全球化均势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3.0时代的典型(金碚,2016)<sup>[20]</sup>,也是主张容纳各国参与其中、共同进步、互利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中国版本(李曦辉,2017)<sup>[21]</sup>。中国提供的全球化版本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发展全球经济,积累尽量多的财富,改善各民族人民的福祉(李曦辉,2019)<sup>[22]</sup>。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将本国的发展同世界的进步相联系,把本国的利益和全球利益相结合,对内减少社会不平等,对外建设包容型的世界经济是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杨娜和王慧婷,2020)<sup>[13]</sup>。以国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中国提出的基于民族互信共荣基础上的新型全球化。这需要进一步强调国内循环的重要作用,重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有机衔接。

### 三、双循环:中国经济发展适应内外部条件变化和历史选择的结果

从字面意义理解,只要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那么就存在“双循环”。以此而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循环”应起源于张骞的凿空西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打通了连接亚欧的古丝绸之路。在此后近2000年的时间里,丝绸之路一直是全线或区段畅通的,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甚至对于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兴起,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不断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自己的格局,时而眼睛向内,重点关注国内经济的发展,时而目光向外,关心国际经济的变化,为的是保证中国经济在国际舞台上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规律性的变化,适应了国内国际经济的发展需要。

中华民族很早就注重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华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人类3000年可考文明史当中有一半以上时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2008)<sup>[23]</sup>的统计数据表明,在人口占优势的传统经济时代,中国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特别是从13世纪开始,中国就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GDP水平也是处于全球前列的国家,从公元10世纪开始到公元16世纪,中国一直领先于国家,GDP总量占全球的份额也一直处于先进行列,在1820年达到了巅峰,占全球总量的32.9%,高于跨入21世纪门槛时美国32.4%的全球占比。2000多年的国际循环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坚持“双赢”原则,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市场的规模与范围,实现了当时生产力水平下所能实现的生产要素配置的最大化规模与范围,注重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保持畅通,才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中华民族在促进形成国际循环的同时,也强化了自身的国内循环,形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模式。

进入工业革命以来,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主要是由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并由此造就了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然而,由于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类文化的异质性趋势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的配置出现了全球化和区域化两种倾向,并影响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鞠建东等,2020<sup>[24]</sup>;刘戒骄,2011<sup>[25]</sup>)。一方面,由于科技进步中的交通运输技术进步和信息通讯技术的革新,给自由贸易带来了两次“解绑”,促进了生产和消费全球化;另一方面,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着区域化的趋势,全球化进程面临着逆动趋势,这主要是由于人类社会存在着文化的异质性(柳思思,2014)<sup>[26]</sup>。塞缪尔·亨廷顿(1999)<sup>[17]</sup>认为,“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通常与具有同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由于文化异质性等原因,全球经济合作中次区域特征越来越明显。在当前全球价值链中,贸易、消费及生产网络的分布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区块化特征(鞠建东等,2020)<sup>[24]</sup>。在当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网络中,开放并不意味着外部财富源源流入,它可能对国家产生冲击,可能在总体有益下包含着

利益分配的相对不利(张幼文,2019)<sup>[27]</sup>。对此,已有的研究数据给予了佐证,目前在全球22个制造业分行业中,中国有12个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只有三个处于高端位置(周维富,2018)<sup>[28]</sup>。各个国家以至各区域,由于各自历史文化特性和行为规则(习俗)特性,其经济主体和经济现象均具有显著的域类质态,表现为极具特色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倾向;不同域类,不仅经济理性嵌入文化观念和制度规则中,而且理性、文化和制度因素间的相依关系使得经济体的域观现象深度交织,浑然一体(金碚,2019)<sup>[29]</sup>。这种越来越民族化、文明归属化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形成,是与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人类经济现实以及越来越多元化趋势的世界分不开的。

新时代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适应内外部条件变化的必然结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否定了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中的片面性理论观点(裴长洪和刘洪愧,2021)<sup>[30]</sup>,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传统工业国家力图削弱中国国际大循环的应对之策(方兴起,2021)<sup>[31]</sup>。“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关键,就在于疏通国内国际循环的“堵点”(张卫良和何秋娟,2021)<sup>[32]</sup>,使得国外产业更加依赖中国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加依赖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黄群慧,2021)<sup>[4]</sup>。因此,作为疏通“堵点”的关键环节,就是要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化中国版本,打破原本国际大循环的壁垒,克服西方传统工业大国主导的“中心—外围”国际循环弊端,塑造新的国际循环,秉持互利共赢原则,实现各国之间互为中心又互为外围,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同时,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推动国内经济充分平衡发展(董志勇和李成朋,2020)<sup>[33]</sup>,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蒋永穆和祝林林,2021)<sup>[34]</sup>,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和“梗阻”,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王一鸣,2020)<sup>[35]</sup>。中国要首先注重经济国内循环的加强,增强经济发展和科技驱动的优势,着眼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之路(高培勇,2021)<sup>[36]</sup>。特别是要推进乡村振兴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的良性互动(郑瑞强和郭如良,2021)<sup>[37]</sup>,实现“乡村中产化”(于立和王艺然,2021)<sup>[38]</sup>,探索基于自身资源禀赋的经济现代化路径(黄群慧,2021)<sup>[39]</sup>。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发展以我为主的“外循环”与依靠“内循环”维持增长动力(丁一凡,2020)<sup>[40]</sup>,实现提升经济全球化公正发展的状态和提升缩差共富分配体系的目标(程恩富和张峰,2021)<sup>[41]</sup>,为破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提供新思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指明新方向,为世界新一轮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蒲清平和杨聪林,2020)<sup>[42]</sup>。

已有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证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例如,郑建明等(2021)<sup>[43]</sup>着重分析了新冠疫情对中国全球价值链造成的影响。李宏等(2021)<sup>[44]</sup>运用随机前沿模型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在OECD国家投入产出数据的基础上,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其细分产业增长效率在全球的真实水平进行了估计。丁晓强等(2021)<sup>[45]</sup>利用中国各省份的投入产出表,分别构造了省份和部门视角下的贸易比较偏好指数,分析了中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地区特征和部门特征。丁守海等(2021)<sup>[46]</sup>研究发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人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已有的“双循环”实证研究对“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循环中作用的实证研究较少,也较少触及国内经济循环中存在的平衡不充分问题。

基于以上理论及实证研究,本文的实证分析以疏通国际循环的“堵点”为关键,以破解国内循环的“痛点”为核心,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疏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堵点”的关键环节,将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作为解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痛点”的核心内容。本文通过聚焦“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参与国和西方传统工业大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厘清“一带一路”倡议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作用,深刻剖析中国版全球化与西方版现实全球化的本质差异。进而,通过聚焦破解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分析国内经济循环的产业发

展情况,总结国内循环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实证分析结果有助于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支持。

#### 四、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特征与趋势:研究设计

基于前文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分析,后文重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中国在驱动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建设的情况。重点是探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践渊源与发展变迁,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作用与发展趋势,以此综合研究和评价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揭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必然和未来方向。

##### 1. 研究方法

(1)投入产出法:投入产出模型可以准确刻画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可以用于分析各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考虑最基本的  $N$  国单部门的投入产出模型:

$$X = AX + Y \tag{1}$$

其中, $N$  维向量  $X$  表示  $N$  个国家各自的总产出值; $N \times N$  矩阵  $A$  为投入产出系数矩阵,亦称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N \times N$  矩阵  $Y$  为最终品的贸易矩阵。

对式(1)进行矩阵变换,可以得到:

$$X = (I - A)^{-1}Y = BY \tag{2}$$

其中, $I$  为  $N \times N$  的单位矩阵, $B$  为里昂惕夫逆矩阵。

依据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得到的结果,即可对国际循环进行分析。在对结果进行进一步加工的基础上,社会网络分析和价值增值分析等方法便可用以验证国际循环的发展状况。国内循环的矩阵构造方法及分析步骤与国际循环类似,只需将不同的国家替换为国内不同的经济部门即可。

(2)社会网络分析法:网络的疏密程度是网络中各节点之间联系密切程度的一个重要表征。为分析各国之间贸易关系的疏密程度,本文引入网络密度。网络密度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rho = \frac{L}{N(N-1)} \tag{3}$$

其中, $L$  为显著关系数, $N$  为所有的节点数。关于显著关系的界定,现有文献中大多采用贸易额的方法(李敬等,2017<sup>[47]</sup>;郑智等,2019<sup>[48]</sup>;梁经纬等,2019<sup>[49]</sup>),即以一给定的贸易额作为判别标准,超过记为显著,否则记为不显著。考虑到各国之间的经济体量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贸易额作为显著关系的判别标准难免有失偏颇。为此,本文提出使用投入产出系数代替贸易额,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同经济体量对分析结果所带来的偏误。参照前人使用贸易额的划分标准,本文提出显著关系的判别规则:

$$L_{ij} = \begin{cases} 1, & A_{ij} \geq Median \\ 0, & A_{ij} < Median \end{cases} \tag{4}$$

其中, $L_{ii} = 0$ ;  $Median$  为投入产出系数的中位数;显著的关系数  $L$  为所有  $L_{ij}$  的和。

为分析各国在网络中的位置,本文引入相对度数中心度。相对度数中心度的值越接近 1,表明该国与网络中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越密切。假设网络中有  $N$  个结点,同时假设  $n_i$  为与  $i$  国具有显著关系的国家数量,则相对度数中心度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DC_i = \frac{n_i}{N-1} \tag{5}$$

利用网络密度计算过程中构造的  $L_{ij}$  的结果,可以方便地得到相对度数中心度计算过程中显著关系数  $n_i$  的值,具体计算公式为:

$$n_i = \sum_{j=1}^N L_{ij} \quad (6)$$

在相对度数中心度的基础上,为进一步衡量不同网络中心化的趋势,本文引入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的值越大,表明网络中各国与处于中心的国家之间的相对度数中心度差异越大,也就是网络的中心化趋势越明显。假设网络中有  $N$  个结点,用  $\text{Max}(DC)$  来表示网络中最大的相对度数中心度,则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NC = \sum_{i=1}^N \frac{\text{Max}(DC) - DC_i}{N - 2} \quad (7)$$

(3)增加值贸易法:根据投入产出模型分析得到的结果,可以进一步分析各国贸易往来过程中所带来的价值增加值的变化。由投入产出系数矩阵  $A$ ,可以计算得到价值增值系数矩阵  $V$ :

$$V = \begin{bmatrix} V_1 & 0 & \cdots & 0 \\ 0 & V_2 & \cdots & 0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0 & 0 & \cdots & V_N \end{bmatrix} \quad (8)$$

其中:

$$V_j = 1 - \sum_{i=1}^N A_{ij} \quad (9)$$

根据上文推导出的投入产出模型及求解得到投入产出系数矩阵,可以进一步计算价值增值矩阵:

$$VA = VB \quad (10)$$

其中,矩阵中的元素  $VA_{ij}$  表示  $i$  国从  $j$  国获取的价值增值。

结合价值增值矩阵的计算结果,本文参照 Timmer 等(2015)<sup>[50]</sup>的做法,将价值增值分解为:本国价值增值、区域价值增值和全球价值增值,同时将绝对值折算成比例,方便进行对比。本文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区域价值增值部分。通过对比区域价值增值占比,可以看出区域对于不同国家的贡献大小。区域增值占比越大,表明该国与区域中各国联系密切,同时贸易往来频繁。

##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国际投入产出表(WIOD)数据。目前 WIOD 有 2013 版和 2016 版,2013 版共有 40 个国家,2016 版则涵盖了 43 个国家 56 个行业 2000—2014 年的贸易往来数据。截至 2020 年 1 月底,与中国已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的有 138 个国家和地区,本文基于 WIOD 数据库的数据可得性确定样本库,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中国首先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数据选取,考虑到国家和地区选取地域的代表性,本文按照“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东亚、南亚、中东、独联体、东欧及南欧的区域划分,选取各区域中 2019 年 GDP 最高值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样本,代表着 3.0 时代的经济全球化(金碚,2016)<sup>[20]</sup>,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俄罗斯、波兰和意大利。考虑到非“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也会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存在贸易往来,同时为了对照参与国与非参与国之间的差异,本文按照四大洲(因非洲数据不可获得,故舍弃)的划分标准,依据四大洲非“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 2019 年 GDP 最高值,选取了四个非“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作为对照样本国家,代表着西方传统工业大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包括日本(亚洲)、德国(欧洲)、美国(美洲)和澳大利亚(大洋洲)。将世界上其他经济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ROW)看待。

所选取的 11 国(包括中国),2019 年 GDP 总和占世界 GDP 总量的 61% 以上(如表 1 所示)。同时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非常密切。由表 2 可知,中国从所选取的 11 国而来的各品类中间品的比值占到了总量的 80% ~ 90% 以上。

表 1 2019 年各国 GDP 占全球 GDP 比重 (%)

国家	AUS	CHN	DEU	IDN	ITA	JPN	KOR	POL	RUS	TUR	USA
占比	1.59	16.28	4.40	1.28	2.28	5.79	1.88	0.68	1.94	0.87	24.43

注:AUS 代表澳大利亚;CHN 代表中国;DEU 代表德国;IDN 代表印度尼西亚;ITA 代表意大利;JPN 代表日本;KOR 代表韩国;POL 代表波兰;RUS 代表俄罗斯;TUR 代表土耳其;USA 代表美国。ROW 的 GDP 占比即为,除去 11 国的占比。下文同此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整理

表 2 中国各年度各品类中间品从 11 国而来所占的比重 (%)

年份	农产品	资源品	低技术品	中技术品	高技术品	服务贸易
1995	97.52	94.31	96.88	97.06	90.79	98.24
2002	98.57	94.30	95.11	97.49	84.74	97.73
2008	96.97	92.01	97.14	97.96	86.61	96.81
2014	97.99	93.88	96.44	98.70	91.94	97.7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WIOD 数据整理

由第二部分的理论可知,针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分析,需要考虑长期的发展情况。因此将“双循环”放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和不断尝试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展开分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后至今为研究区间,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分别选取 1995 年、2002 年、2008 年、2014 年和 2018 年作为国际循环研究的五个时间点。

就国内循环的分析而言,由于中国在每逢尾数为 2 和 7 的年份公布投入产出表,尾数为 0 和 5 的年份公布延长表。根据目前可获得的数据,以及国际循环所使用的年份,本文最终采用 1995 年、2002 年、2007 年、2015 年和 2018 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对国内循环展开分析。本文后续在处理数据时,由于 1995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部门太少<sup>①</sup>,并且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虽然分类标准进行了数次的更新,但大体的框架未曾进行大的修改。因此,本文在国内循环的分析中舍弃掉 1995 年数据,采用 2002 年、2007 年、2015 年和 2018 年的数据,所选取的年份数据均按照最新版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 2017)进行整合。

## 五、实证检验结果

### 1. 国际经济循环的特征与趋势

(1)中间品来源特征与趋势:中国中间品来源比例仍然主要依赖于西方传统工业国,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获得中间品的比例逐渐上升。中间品贸易额方面。首先去除中国和 11 个样本国之外,分析其余 10 个国家对于中国各品类中间品的贸易额。1995—2014 年期间,韩国和日本始终是各品类中间品来源的两个头号大国。同时各国对于中国各品类贸易额均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为更加直观地分析各国各品类中间品贸易的真实情况,本文将所有国家分为中国本国、“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和西方传统工业国,分析中间品贸易的来源(表 3)。

表 3 中国中间品来源的比例 (%)

年份	区域	农产品	资源品	低技术品	中技术品	高技术品	服务贸易
1995	本国来源	95.87	88.99	91.26	90.64	78.83	96.70
	“一带一路”参与国	0.18	2.50	2.42	0.65	1.80	0.54
	西方传统工业国	1.46	2.82	3.20	5.77	10.16	1.00

① 1995 年为 17 个部门,2002 年为 122 个部门,2007 年为 135 个部门,2015 年为 42 个部门,2018 年为 153 个部门。

续表 3

年份	区域	农产品	资源品	低技术品	中技术品	高技术品	服务贸易
2002	本国来源	97.57	90.97	91.38	92.50	77.56	96.54
	“一带一路”参与国	0.19	1.74	1.40	0.42	1.93	0.31
	西方传统工业国	0.80	1.59	2.32	4.57	5.25	0.88
2008	本国来源	95.50	88.16	94.69	92.55	78.16	94.98
	“一带一路”参与国	0.45	1.70	0.70	1.17	3.33	0.65
	西方传统工业国	1.02	2.16	1.75	4.24	5.11	1.18
2014	本国来源	97.00	91.26	95.14	95.69	87.68	96.31
	“一带一路”参与国	0.20	1.08	0.41	0.70	2.10	0.46
	西方传统工业国	0.80	1.55	0.89	2.31	2.16	0.9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WIOD 数据整理

对于农产品、中技术品和高技术品而言,2014 年中国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所获得的中间品中,农产品、中技术品、高技术品占比相较于 1995 年呈现增加的趋势;同时 2014 年从西方传统工业国所获得的中间品占比相较于 1995 年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而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贸易合作更加密切。但同时也需指出的是,尽管西方传统工业国的各品类比例都在下降,但是到 2014 年时,“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在各品类上依然没有超过西方传统工业国,也就是西方传统工业国依然是中国各品类中间品的主要来源国。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构建的国际经济循环是在西方传统工业国的主导下的全球化模式,此时国际经济循环的主要利益仍掌握在西方传统工业国的手里。

考虑到国家数量的差异,本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选择了六个国家(除中国外),而在非“一带一路”倡议即西方传统工业国选择了四个国家。虽然通过各年度整体的比较可以发现年份趋势上的变化,但考虑到严谨性,本文通过对比“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和西方传统工业国的均值差异,以更好地反映中间品贸易的实际情况。通过分析发现,从平均值角度来看,各年度从西方传统工业国所获得的各品类中间品均超过了“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同时计算“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和西方传统工业国的增长率变化情况,由表 4 可知,“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在农产品、中技术品、高技术品和服务贸易方面的增长率均超过西方传统工业国。因此,从平均值视角和总和视角,本文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2013 年以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带动下,中国的国际经济循环开始主动发生改变,“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在中国的国际经济循环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表 4 中国中间品来源的平均增长率 (%)

类别	农产品	资源品	低技术品	中技术品	高技术品	服务贸易
“一带一路”参与国	280.00	129.90	45.56	379.54	288.44	233.95
西方传统工业国	150.87	176.09	84.06	136.81	116.45	183.4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计算结果整理

(2)投入产出特征与趋势: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经济互动程度不断增强,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根据投入产出模型,本文结合 WIOD 整理得到的数据,可以计算得到不同年份不同产品类别的直接消耗系数的结果。直接消耗系数反映的是各国每产出一单位价值量,相应需要消耗出口国多少单位的价值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关系(孙天昊和王妍,2016)<sup>[51]</sup>。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定义式(1)中  $A_{ij}$  为  $j$  国对于  $i$  国的经济互动系数。本文站在中国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循环,因此重点分析中国对于别国的经济互动系数。按照 1995—2014 年的各类别直接消耗系数计算,选取各类别系数值最大的前三个国家,罗列其排序变化,计算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中国与别国经济互动系数排名(前三名)

类别	1995 年	2002 年	2008 年	2014 年
农产品	USA > AUS > IDN	AUS > USA > IDN	USA > IDN > AUS	USA > AUS > IDN
资源品	KOR > JPN > USA	KOR > JPN > IDN	KOR > AUS > JPN	AUS > KOR > JPN
低技术品	JPN > KOR > USA	JPN > KOR > AUS	JPN > KOR > DEU	JPN > KOR > AUS
中技术品	JPN > DEU > USA	DEU > USA > JPN	JPN > DEU > KOR	DEU > JPN > KOR
高技术品	JPN > USA > KOR	JPN > KOR > USA	KOR > JPN > DEU	KOR > JPN > DEU
服务贸易	USA > JPN > KOR	AUS > USA > JPN	USA > DEU > RUS	USA > DEU > AUS
总体	JPN > KOR > USA	JPN > KOR > USA	JPN > KOR > USA	KOR > JPN > AUS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由计算结果可知,在国际循环中,1995—2014年,总体直接消耗系数最大的国家从日本变化为韩国。具体分类而言,农产品直接消耗系数最大的国家主要是美国,资源品直接消耗系数最大的从韩国变化为澳大利亚,低技术品直接消耗系数最大的国家一直是日本,中技术品直接消耗系数最大的国家从日本变化为德国,高技术品直接消耗系数最大的国家是从日本变化为韩国,服务贸易直接消耗系数最大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可以看出,直到2014年,中国对于西方传统工业国的经济互动系数依然较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高技术品等领域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依赖已经超过了西方传统工业国。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韩国也超过了传统工业国的日本,成为中国经济互动系数最大的国家。因此,应当注意到中国参与国际循环中所做出的一些成功的转型,同时也要注意中国对于西方传统工业国仍然存在较大的依赖。可以看出在“逆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与西方传统工业大国的经济互动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互动程度不断增强,各国之间的发展联系越来越紧密。

(3)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特征与趋势分析: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

首先,分析网络密度。网络密度是衡量网络中各国之间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本文依据设定的中位数标准,计算各个网络中显著的关系数,进而可以依据式(3)计算得到网络密度,如表6所示。除服务贸易外,对于其他类别的产品和总体,1995—2014年,显著关系数处于波动上升的状态。从而表明除服务贸易外,其他品类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表 6 各年份各品类的网络密度

类别	1995 年	2002 年	2008 年	2014 年
农产品	0.492	0.432	0.515	0.561
资源品	0.439	0.470	0.538	0.553
低技术品	0.462	0.447	0.530	0.561
中技术品	0.379	0.470	0.561	0.591
高技术品	0.462	0.492	0.485	0.561
服务贸易	0.538	0.470	0.515	0.477
总体	0.439	0.455	0.553	0.55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其次,分析网络中各节点的相对度数中心度和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由相对度数中心度的变化可知,1995—2014年期间,中国各品类的相对度数中心度都呈现了显著的增长趋势。1995年各品类的相对度数中心度都较小,也就是和其他各国的经济联系不够紧密,没有完全融入到国际循环中去;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经济体量小,这也是导致相对度数中心

度较小的原因。到 2014 年时, 中国的相对度数中心度有了快速的增长, 各品类的相对度数中心度都为 1, 即中国与其他各国的联系都非常密切, 表明中国经济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得到了飞速发展, 同时国际循环也得到了加强, 在国际循环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分析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的变化情况可知, 除服务贸易表现出增大的趋势外, 其他各品类的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均呈现减小的趋势。从而表明除服务贸易外, 其他品类的国际贸易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 具体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各年份各品类的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值

类别	1995 年	2002 年	2008 年	2014 年
农产品	0.609	0.682	0.582	0.527
资源品	0.673	0.636	0.555	0.536
低技术品	0.646	0.664	0.564	0.527
中技术品	0.746	0.636	0.527	0.491
高技术品	0.646	0.609	0.618	0.527
服务贸易	0.555	0.636	0.582	0.627
总体	0.673	0.655	0.536	0.536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4) 增加值的特征与趋势: 中国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获得价值增值的增长势头更为强劲, 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增加值提升的贡献度不断提升。从增加值的角度分析, 美国、日本和德国是中国增加值的主要来源国家。为了方便分析本国、“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和西方传统工业国的增加值来源情况, 本文计算了各自的占比, 如表 8 所示。由结果可知, 1995—2014 年期间, 对于资源品、低技术品和服务贸易而言, 中国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所获得的价值增值比例在逐步增加, 而西方传统工业国的比例均在逐步缩小。同时需指出, 在中国价值增加值来源国家的比较中, “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始终未能超过西方传统工业国。

表 8 不同区域增加值占价值增值总和的比重 (%)

年份	区域	农产品	资源品	低技术品	中技术品	高技术品	服务贸易
1995	本国来源	91.73	56.91	75.03	77.31	91.73	56.91
	“一带一路”参与国	1.10	3.44	2.31	1.34	1.10	3.44
	西方传统工业国	4.60	23.22	14.95	12.63	4.60	23.22
2002	本国来源	93.86	62.59	78.16	85.04	93.86	62.59
	“一带一路”参与国	1.18	3.75	2.39	1.29	1.18	3.75
	西方传统工业国	2.88	18.25	10.72	5.52	2.88	18.25
2008	本国来源	92.83	37.66	74.97	74.87	92.83	37.66
	“一带一路”参与国	1.21	6.42	4.08	3.31	1.21	6.42
	西方传统工业国	2.78	29.33	9.17	6.32	2.78	29.33
2014	本国来源	94.24	46.68	83.07	85.33	94.24	46.68
	“一带一路”参与国	0.80	5.32	2.70	1.30	0.80	5.32
	西方传统工业国	1.96	21.01	5.43	3.50	1.96	21.01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和西方传统工业国对于中国价值增值平均贡献的分析可以得出, 如表 9 所示, 1995—2014 年期间, 平均价值增值都在增加, 同时西方传统工业国的增值始终大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 这与整体分析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 “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在平均增加值的增长势头上是优于西方传统工业国的。也就是中国在国际经济循环中, 更多的价值增值依然是从西方传统工业国而来, 但是“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增长势头更为强劲。

表 9 中国增加值来源的平均增长率 (%)

类别	农产品	资源品	低技术品	中技术品	高技术品	服务贸易
“一带一路”参与国	69.02	-144.09	214.97	464.74	338.80	69.02
西方传统工业国	47.45	-163.03	89.43	190.14	182.68	47.4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计算结果整理

表 10 “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价值增值占价值增值总和的比重 (%)

年份	区域	CHN	IDN	ITA	KOR	POL	RUS	TUR	均值
1995	本国来源	79.90	80.83	78.51	75.97	78.39	76.64	88.53	79.83
	“一带一路”参与国	1.85	2.75	1.62	3.42	2.84	4.40	1.72	2.66
	西方传统工业国	18.25	16.42	19.86	20.61	18.77	18.96	9.74	17.52
2002	本国来源	79.46	73.32	79.34	73.70	75.68	70.95	71.81	74.89
	“一带一路”参与国	1.75	4.14	1.59	4.43	2.65	4.88	3.76	3.32
	西方传统工业国	18.79	22.54	19.07	21.86	21.67	24.16	24.43	21.79
2008	本国来源	72.04	75.34	77.66	63.78	69.35	72.43	76.22	72.40
	“一带一路”参与国	3.06	4.23	2.53	8.88	4.37	5.68	4.08	4.69
	西方传统工业国	24.90	20.43	19.82	27.35	26.29	21.89	19.70	22.91
2014	本国来源	79.71	79.63	75.01	61.60	62.15	73.89	72.58	72.08
	“一带一路”参与国	2.15	3.60	3.31	11.03	5.12	4.42	4.15	4.83
	西方传统工业国	18.14	16.77	21.68	27.37	32.72	21.69	23.27	23.09
“一带一路”参与国均值		2.20	3.68	2.26	6.94	3.74	4.84	3.43	3.8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由表 10 可得,从增加值双向流动的角度看,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各国区域价值增值的贡献大于中国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索取,也就是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各国的增加值提升的贡献能力高于中国从其中获取增加值的能力(郑智等,2019)<sup>[48]</sup>。“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时期中国国际经济循环的重要体现,展现出“一带一路”倡议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主导的传统全球化,克服了传统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和发展陷阱等弊端,体现出“全球化均势发展”的新特征(金碚,2016)<sup>[20]</sup>。由分析结果可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沿线各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机会,沿线各国从“一带一路”倡议的获益都在逐年上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增长不断产生更大的贡献。

(5)2018 年投入产出表的预测更新:“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的国际经济循环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鉴于 WIOD 数据最新年份为 2014 年,本文使用 1995—2014 年数据来进行分析难免会存在滞后性的问题。因此,为了构造投入产出模型所需的数据,本文采用多年份 WIOD 得到的两国之间的贸易数据来计算两国之间的中间品和最终品的比例,用以作为 2018 年两国之间中间品和最终品的比例,结合 2018 年 UN Comtrade 数据库中各国的贸易总额,即可计算得到各个国家之间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贸易额,用以近似替代 2018 年各国之间投入产出表的部分数据。在此基础上,采用投入产出表的更新方法来对剩余的货物贸易的数据进行更新。虽然投入产出表的更新会存在误差,无法准确地反映 2018 年的真实情况。但是,在数据无法获得的情况下,通过数据的更新,依然可以得出发展的大体趋势,不会对本文的分析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为此,基于 EGRAS 方法,本文测算 2018 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具体的模型为:

$$\min \sum_i \sum_j (z_{ij} - 1) \ln z_{ij} \quad \text{s. t.} \quad \left[ \frac{\sum_j z_{ij} x_{ij}}{\sum_j z_{ji} x_{ji}} - \frac{\sum_j x_{ij}}{\sum_j x_{ji}} \right] \leq \varepsilon_i \quad (11)$$

其中,已知年份的投入产出系数为  $X = [x_{ij}]$ ,求解更新的目标矩阵  $X^* = [x_{ij}^*]$ ,  $z_{ij} = x_{ij}^* / x_{ij}$ ,

$\varepsilon_i$  为给定的精度值。利用此模型和 2014 年货物贸易的投入产出表可以更新得到 2018 年的投入产出表, 进而可以计算得到直接消耗系数。计算中国对别国直接消耗系数的排名如表 11 所示。

表 11 2018 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的直接消耗系数排名

国家	AUS	DEU	IDN	ITA	JPN	KOR	POL	RUS	TUR	USA
排名	3	6	7	8	2	1	10	5	9	4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由分析结果可知, 2018 年的排名大致与 2014 年相似。排第一的是韩国, 其次是日本, 澳大利亚和美国紧随其后。排在第五六位的国家发生了对调, 由 2014 年的德国和俄罗斯变成了 2018 年的俄罗斯和德国。从而前文所得出的结论在 2018 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过程中, 和“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经济互动联系往来越来越密切。

## 2. 国内经济循环的特征与趋势

(1) 三次产业变迁: 中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完善, 为国内经济循环提供巨大潜力和发展空间。对于国内经济循环的分析, 本文先将各年份行业按照传统三次产业的划分标准予以分析, 从宏观上厘清国内循环的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 再按照不同行业的分类, 从微观层面展开分析。本文将各年度中国投入产出表调整为三次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表, 进而应用投入产出模型求解得到直接消耗系数。结果如表 12 所示。

表 12 三次产业划分下的直接消耗系数

分类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1995	0.172	0.068	0.015
	2002	0.162	0.053	0.016
	2007	0.141	0.043	0.013
	2015	0.130	0.051	0.010
	2018	0.126	0.042	0.008
第二产业	1995	0.173	0.541	0.260
	2002	0.176	0.528	0.249
	2007	0.210	0.632	0.251
	2015	0.240	0.601	0.184
	2018	0.186	0.560	0.157
第三产业	1995	0.057	0.105	0.174
	2002	0.079	0.130	0.203
	2007	0.063	0.092	0.201
	2015	0.043	0.141	0.275
	2018	0.074	0.149	0.304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李斯特(2011)<sup>[52]</sup>提出, “就一个国家整个工业与农业相互间的关系来说, 它们彼此之间所处的地位愈接近, 双方物资交流时所受到的障碍愈少, 则共同发展的机会愈大” “凡是一个国家, 既培养了在它领域以内工业的一切部门, 使工业达到了高度完善阶段, 又拥有广大疆土和充分发展的农业, 使它工业人口在生活必需品和原料方面的需要, 绝大部分可以由本国供应, 那么它就拥有最高的生产力, 因而也就是最富裕”。由表 12 可知, 1995—2018 年期间, 第一产业对于第二产业的依赖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 其中 1995—2015 年处于持续增加的状态, 2018 年相较于 2015 年有所下降, 但是相对于 1995 年来看, 依然是超过了 1995 年的。这表明, 每产出一单位的第一产业产品, 需要消耗更多单位的第二产业产品。这与农业机械化、自动化的进程, 以及农药、种子、化肥等农产物

品的极大丰富是吻合的。同时,由分析结果可知,第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依赖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第三产业自身的依赖在逐渐增强。也就是说,第三产业内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逐步超过了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依赖。

(2) 各行业特征与变化趋势:国内经济循环的各行业发展呈现逐步向好态势,但行业之间的经济互动程度有待继续提高。由于1995年投入产出表分类较粗糙,本文舍弃1995年的数据,分析2002—2018年国内循环的变化。农业对于制造业依赖呈现出先增后减,但整体依然是保持上升的态势,国内经济循环中农业与工业的联系始终处于增加的状态,说明国内循环中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向好。

为重点分析国内循环的问题所在,本文着重分析各行业对于制造业的依赖情况。2002—2018年,建筑业对于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农、林、牧、渔业对于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一开始处于靠后的位置,后逐渐提升;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从最初靠后的状态提升到了非常靠前的位置;而对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教育二者而言,对于制造业的依赖排名仅有小幅提升。具体结果如表13所示。

批发和零售业对于制造业依赖的排名有所下降,这不代表批发和零售业呈现出衰退的迹象,反而表明批发和零售业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是息息相关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满足,从而导致对于实物需求的比例逐步减少。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对于制造业依赖的排名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该变化与我国在相关领域制造能力不强具有密切的关系。

表 13 各行业对于制造业直接消耗系数的排名

部门	2002	2007	2015	2018
农、林、牧、渔业	13	11	9	9
建筑业	1	1	1	1
批发和零售业	12	16	16	1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	6	8	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	12	11	1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1	8	5	5
教育	16	13	15	1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3) 社会网络特征与变化趋势:国内各产业部门的中心化发展趋势明显,各产业部门的网络密度呈现下降趋势。从各年份国内循环中网络的密度变化情况来看(表14),2002—2015年网络密度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2018年相较于2015年虽有所回升,但与2002年和2007年相比依然是下降的。从而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疏远,整个国内循环出现了阻碍发展的问题。

表 14 国内循环的网络密度

年份	显著数	网络密度
2002	181	0.529
2007	170	0.497
2015	165	0.483
2018	168	0.49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各产业部门的相对度数中心度和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结果显示(表15),制造业的相对度数中心度一直为1,也就是说,制造业在各年份的网络中都处在中心的位置。这与制造业作为国家生产

力发展水平的重要表征是分不开的,也体现了国家对于发展制造业的重视。其他各行业的相对度数中心度也都维持在了一定的水平,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减小的趋势,从而表明国内循环整体良性发展的同时,部分行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受到了削弱。2002—2015年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2018年相较于2015年虽有所下降,但与2002年和2007年相比依然是升高的。从而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各个行业之间呈现出中心化越来越明显的趋势。

表 15 国内循环的社会网络分析

部门	2002	2007	2015	2018
农、林、牧、渔业	0.444	0.333	0.389	0.333
制造业	1.000	1.000	1.000	1.000
批发和零售业	0.944	0.889	0.944	0.94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00	0.889	1.000	0.94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833	0.500	0.500	0.72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056	0.278	0.222	0.222
教育	0.056	0.111	0.056	0.056
NC(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	0.526	0.562	0.578	0.56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4)各产业横向比较:中国形成了成熟完整的产业体系结构,但产业发展之间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了反映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本文以美国<sup>①</sup>和日本<sup>②</sup>为参照,其中美国作为2019年全球GDP最高的国家,日本作为亚洲除中国外GDP最高的国家,分析它们的内循环发展状况,以期发现畅通国内循环的主要突破口。首先,从宏观视角分析三个产业的情况,本文计算得到直接消耗系数(表16)。在直接消耗系数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各行业对于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及相对度数中心度的情况(表17)。

表 16 美国和日本三个产业划分下的直接消耗系数

2015年 产业	美国			日本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0.158	0.025	0.001	0.122	0.021	0.003
第二产业	0.179	0.265	0.100	0.243	0.470	0.099
第三产业	0.076	0.060	0.335	0.159	0.145	0.247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由分析结果可知,美国农业对于制造业的依赖程度非常高。从而体现为其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日本的农业对制造业的依赖仅次于建筑业,排在第二位,也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就批发零售业而言,美国也是遥遥领先中国排名的;美国和日本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也是优于中国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值得借鉴和学习。同时,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中国略胜一筹。整体而言,在西方国家所优先发展起来的行业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而在中国占领先地位的新兴行业(如5G等)中,中国较西方国家有更好的结构,形成了成熟完整的产业体系结构。

<sup>①</sup> 美国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官方网站, <https://www.bea.gov/data/industries/input-output-accounts-data>。结合中国和日本的数据情况,本文选择2015年投入产出表来做对比,访问日期:2020-11-23。

<sup>②</sup> 日本数据来源:日本统计年鉴, <http://www.stat.go.jp/data/nenkan/70nenkan/zenbun/jp70/book/book.pdf>。其中公布了平成27年(2015年)的投入产出表,访问日期:2020-11-23。

表 17 中、美、日重点行业对于制造业的依赖程度排序

部门	美国(15)		日本(13)		中国(19)
	制造业依赖排序	DC(相对度数中心度)	制造业依赖排序	DC	制造业依赖排序
农、林、牧、渔业	5	0.214	2	0.083	9
制造业	-	1.000	-	0.917	-
批发和零售业	2/1 <sup>a</sup>	0.071/0.000	- <sup>b</sup>	-	1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	0.429	3	0.917	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1	0.714	9	0.583	1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3	1.000	-	-	5
教育	8	0.214	-	-	15

注：<sup>a</sup> 美国的行业分类将批发业(Wholesale trade)和零售业(Retail trade)作为两个类别；<sup>b</sup> 在日本的行业分类中无法找到相同或类似的行业分类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 六、结论与建议

### 1. 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价值增值分析等方法,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从“一带一路”倡议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视角探讨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发展情况和实施效果,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主导的国际循环新理念,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使得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为各国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机会,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贡献大于所得。各国对于中国的经济互动系数以及各国之间的经济网络密度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中国从“一带一路”生产网络中获得的区域价值增值在不断降低,而其他各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获得的价值增值在逐年增加,并始终大于中国。(2)“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驱动而形成的,中国的国内经济循环逐渐发展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但各行业之间的经济互动程度和网络密度较低,呈现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征,特别是体现在农业现代化的程度依然较低。总体而言,可以看出,中国在不断强化自身国内循环的同时,也为国际循环贡献力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中国版全球化的发展范式,能够突破当前西方传统工业大国主导的全球化的不足,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生产要素配置的更大规模与范围效益,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从而引领世界经济发展走势。

### 2. 政策建议

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符合当今经济发展的需求,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三次社会主要矛盾变迁勾勒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演变进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同时国际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的涌现,迫切地需要转变发展思路。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点,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破题的关键,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前进的必然选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施成效将决定着未来中国乃至世界格局的走向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式。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际经济循环的突破口,将促进国内大循环的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内经济循环的着力点。

一方面,要完善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推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形成良性互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发展,而是要求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需要打破的是过度依赖欧美消费市场,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西方国家“卡脖子”关键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位

置中处于低端环节的传统国际经济循环发展模式。中国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势, 首先针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薄弱环节, 利用沿线各国(地区)经济体生产环节的相对比较优势以及生产要素和资源, 构建起以中国为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并主动延伸到沿线各国(地区), 继续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创造新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 开辟新的国际市场, 打造生产与消费更加均衡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 中国要充分利用国内超大规模的内需潜力和市场优势, 进一步面向“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各国(地区)开放国内市场, 扩大沿线各国进口贸易种类和份额, 激活国内市场活力, 使得各国发展分享中国消费市场红利, 更加依赖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

另一方面, 在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胜利后, 中国的国内经济循环要注重将实现乡村振兴作为下一阶段发展的重要内容, 作为破解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手段。要注重从乡村获得资源支持, 探索城乡联动、内外互动的现代化建设模式。特别是要注重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现在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对安全的关切甚至超过了效率和公平(金碚, 2021)<sup>[53]</sup>。应当重点关注农业机械化与现代化的发展, 增大科研投入, 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通过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和社会帮扶机制等外部力量, 帮助乡村建设来完善市场经济环境条件, 加大对乡村建设的帮扶力度, 推动乡村建设尽快高质量融入国民经济的潮流之中。贯彻科教兴国战略, 走科技强国之路, 加快科技创新步伐, 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创新突破, 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J]. 北京:求是, 2020, (21): 4-10.
- [2] 欧阳康. 全球治理变局中的“一带一路”[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8): 5-16.
- [3] 傅梦孜. 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化的未来[J]. 北京: 现代国际关系, 2020, (5): 7-12.
- [4] 黄群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与形成建议[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1): 9-16.
- [5] 裴长洪, 刘洪愧. 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 基于习近平百年大变局重要论断的思考[J]. 北京: 经济研究, 2020, (5): 4-20.
- [6] 毛泽东. 我们的经济政策[A].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7.
- [7] 刘建丽. 新中国利用外资70年: 历程、效应与主要经验[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9, (11): 19-37.
- [8] 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N]. 北京: 人民日报, 1976-12-26.
- [9]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N]. 北京: 人民日报, 1981-07-01.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 [11] 王建. 选择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N]. 北京: 经济日报, 1988-01-05.
- [12] 余森杰. “大变局”与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20, (6): 19-28.
- [13] 杨娜, 王慧婷.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J]. 长春: 东北亚论坛, 2020, (6): 39-50.
- [14] 莱斯利·里普森. 政治学的重大问题: 政治学导论[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 [15] 于春阳. 全球化时代何以“反对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终结论”、“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等观点的析评[J]. 成都: 社会科学研究, 2015, (2): 70-76.
- [16] 任剑涛. 找回国家: 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凯旋[J]. 上海: 探索与争鸣, 2020, (3): 26-41.
- [17]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 [18] 裴长洪, 刘斌.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 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2020, (2): 46-69.
- [19] 刘伟, 王文.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9, (3): 1-16.
- [20] 金碚. 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 2016, (1): 5-20.
- [21] 李曦辉. 全球化中国版之“一带一路”支撑理论研究——兼论民族经济学的时代价值[J]. 郑州: 区域经济评论, 2017, (6): 62-73.
- [22] 李曦辉. 全球化中国版本与新民族经济学——兼论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J]. 呼和浩特: 财经理论研究, 2019, (1): 1-9.
- [23] 安格斯·麦迪森. 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M].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8.

- [24] 鞠建东,余心珂,卢冰,李昕. 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三足鼎立”格局分析[J]. 北京:经济学报,2020,(4):1-20.
- [25] 刘戒骄. 生产分割与制造业国际分工——以苹果、波音和英特尔为案例的分析[J].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1,(4):148-157.
- [26] 柳思思.“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新进路[J]. 北京:南亚研究,2014,(2):1-11.
- [27] 张幼文. 70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决定因素与历史逻辑[J]. 上海:世界经济研究,2019,(7):3-12.
- [28] 周维富. 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困境及其转型升级对策[J]. 长春:经济纵横,2018,(3):52-57.
- [29] 金碚. 论经济学域观范式的识别发现逻辑[J].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9,(7):5-23.
- [30] 裴长洪,刘洪愧. 构建新发展格局科学内涵研究[J].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21,(6):5-22.
- [31] 方兴起. 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J]. 北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2):68-74.
- [32] 张卫良,何秋娟.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优越性及其构建[J]. 兰州:甘肃社会科学,2021,(1):41-48.
- [33] 董志勇,李成明.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溯源、逻辑阐释与政策导向[J].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5):47-55.
- [34] 蒋永穆,祝林林. 构建新发展格局:生成逻辑与主要路径[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29-38.
- [35] 王一鸣. 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 北京:管理世界,2020,(12):1-13.
- [36] 高培勇. 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前行[J]. 北京:经济研究,2021,(3):4-13.
- [37] 郑瑞强,郭如良.“双循环”格局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进路研究[J].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9-29.
- [38] 于立,王艺然.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乡村中产化的实施路径探讨[J]. 长沙:经济地理,2021,(2):167-173.
- [39] 黄群慧.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J]. 北京:经济研究,2021,(4):4-23.
- [40] 丁一凡.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新发展格局[J]. 北京:当代世界,2020,(11):4-10.
- [41] 程恩富,张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长沙:求索,2021,(1):108-115.
- [42] 蒲清平,杨聪林.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实施路径与时代价值[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24-34.
- [43] 郑建明,杨策,王万军.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全球价值链演化及中国对策——基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视角[J].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1,(2):69-78.
- [44] 李宏,牛志伟,邹昭晞.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制造业增长效率——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J]. 大连:财经问题研究,2021,(3):38-48.
- [45] 丁晓强,张少军,李善同. 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内外导向选择——贸易比较偏好视角[J]. 北京:经济管理,2021,(2):23-37.
- [46] 丁守海,徐政,张普阳.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 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133-146.
- [47] 李敬,陈旒,万广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的竞争互补关系及动态变化——基于网络分析方法[J]. 北京:管理世界,2017,(4):10-19.
- [48] 郑智,刘卫东,宋周莺,叶尔肖·吾扎提,梁宜.“一带一路”生产网络及中国参与程度[J]. 北京:地理科学进展,2019,(7):951-962.
- [49] 梁经纬,文淑惠,李彦. 东亚制造业生产网络的变化特征研究——基于贸易网络的分析视角[J]. 上海:世界地理研究,2019,(4):156-165.
- [50] Timmer M P, Dietzenbacher E, Los B, et al. An Illustrated User Guide to the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The Case of Global Automotive Production[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23, (3): 575-605.
- [51] 孙天昊,王妍.“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经济互动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J]. 昆明:经济问题探索,2016,(5):114-120.
- [52]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53] 金碚.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开启中国经济新征程[J]. 郑州:区域经济评论,2021,(1):5-9.

# Constructing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 China’s New Strate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LI Xi-hui<sup>1</sup>, YI Sheng-hui<sup>1</sup>, HUANG Ji-xin<sup>1,2</sup>

(1.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is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that CPC has mad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lea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a century.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ina’s economy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is driven by the endogenous factors of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of history and has realistic and feasible conditions.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can provide the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new globalization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It can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the current globalization and achieve greater scale and scope benefits of 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can realize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paper uses input-output data at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evels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through the methods of input-output analysi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value-added analysi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practic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 change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and discusses the key role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result of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as a China-dominated international cycle, has promoted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to enhance China’s posi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making China closer to the world economy, it will create vast business possibilities for other countries, and this will create stronger impetus for maintaining stable growth of the global economy. With vast market opportunities, China’s contribution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is greater than its ear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is driven by the endogenous facto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perfected, forming a complete industrial structure system. However, the economic interaction and network density between various industries is relatively low,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especially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still low.

On the whole, China is in a great change that has not happened in a century, and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development. The proposal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conforms to the needs of toda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hil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its own domestic circulation, China contributes its own strength to the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requir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as a breakthrough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an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the focal point of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can provide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globalization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which can break through the current shortcomings of globalization led by Western traditional industrial powers, achieve higher-standard open economy, and realize 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More large-scale and scoped benefits will form new advantag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chieve robust, sustainable, balanced and inclusive growth for all.

**Key Words:**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input-output model;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JEL Classification:** O14, F14

**DOI:** 10.19616/j.cnki.bmj.2021.07.001

(责任编辑:李先军)